

# 江苏学者参与“国史”大修

## 再校“二十四史”重拾史学传统

上世纪50年代,毛泽东指示点校“二十四史”,一大批当时最优秀的学者参与点校,遗憾的是,由于种种原因,当时江苏并没有参与此项工作。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,是规模最大、影响最为深远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,但由于当时政治、经济、学术等客观条件的制约,点校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憾。

这次,国家启动点校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修订工程,江苏有三位学者参与其中——“二十四史”之首《史记》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系的赵生群主持修订,南朝《宋书》由江苏盐城院中文系的丁福林主持修订,记载五千年国史最辉煌阶段的《新唐书》由南京大学古文文献研究所的武秀成主持修订。为何要重新修订?如何修订?目前进展如何?本周刊对话多位文史界学者。

□快报记者 陈曦



南京大学在办公资源紧张的情况下,拨出一间办公室专门校订《新唐书》 快报记者 路军摄

### ■ 新闻链接

## 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

“二十四史”是中国古代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,按照各史所记朝代的先后排列,分别为: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隋书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、《旧五代史》、《新五代史》、《宋史》、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、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。清代乾隆皇帝钦定“二十四史”,“正史”一称即专指“二十四史”。

《清史稿》由民国初年设立的清史馆编修。该书尽管存在不少缺陷,但它按纪传体史书的体裁,对清代人物、史事及典章制度进行了详细叙述,1920年代起,被纳入“正史”系列,与“二十四史”并称。

### “二十四史”主要传世版本

武英殿本。武英殿,清代官殿名,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內。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刊刻二十四部史书于此,称武英殿本,简称殿本,由乾隆钦定。

百衲本。民国时期,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主持搜集各史最佳善本,影印出版,前后历时十八年。因该版本由许多刻本相互参校,补缀而成,有如僧人的百衲衣,故名百衲本,简称“衲本”,于1936年出版。仍然没有标点,没有断句,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。

点校本。上世纪50年代,毛泽东指示点校“二十四史”,中华书局承担组织工作,于1978年出齐。这个版本一出,被公认为当前最好的整理本,完全取代旧本,以其符合规范的标点校勘和便于阅读的印装形式,很快成为“二十四史”的现代标准本。

### “点校本”曾举全国之力

宋元以来历代都有整理刊印正史的传统,形成不同时期的通行版本,如宋代通行的“十七史”、明代通行的“二十一史”,清乾隆时期整理刊刻武英殿本“二十四史”。上世纪30年代,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百衲本“二十四史”,是近代最通行版本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在中央指示下,中华书局组织实施“二十四史”的整理,形成第一部有完整标点校勘的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和《清史稿》,“第一次将全套正史从古董书架上请了下来,成为人人可读的现代整理本”。整理工作从1958年到1978年,经历了20年。如今,全书出齐已经超过三十二年,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权威版本,印数最多,《史记》至今已经售出约七十万套,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绩。台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全部翻印了点校本,称为新校本,为了“别苗头”,还计划组织“二十四史”新注本,可惜没有完成。

在整理“二十四史”之前,1963年,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,毛泽东指示吴晗,让他和范文澜一起组织校点《资治通鉴》,1966年完成出版。

同年,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在《人民日报》撰文,提出要整理出版“面貌全新、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”。1968年,毛泽东指示吴晗、范文澜组织标点“前四史”(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),作为建国十周年献礼。

点校本受质疑相对集中的就是底本的选择。每部史书在历史上都有众多不同版本,这就要求我们一直关注这些意见,也觉得应该趁当年参加点校工作的部分老先生、中华书局参加过点校的一些老编辑还健在,能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的时候,尽快组织修订。”

由于时间比较紧,导致“前四史”的整理方式、体例都不一样。《史记》就直接用了顾颉刚在1936年出版的《点校〈史记〉白文》的本子,赶在1959年国庆前夕出版,《三国志》在当年底问世,前后《汉书》一直到1965年才陆续完成。总体而言,“前四史”尽管影响很大,但点校质量在“二十四史”中是较差的,尤其《史记》、《三国志》两种都没有出校勘记,对于学者利用很不方便。

在落实“前四史”工作的同时,其余二十史的工作也全面展开。1960年到1966年是整理工作的第二阶段,由于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与支持,点校“二十四史”成了当时学术界倾注全力的一项工程。作为一项政治任务,专家们被安排集中住在北京的中华书局,全力展开工作,在人员配置、工作条件、图书资料调拨等方面都得到国家各方面的全力配合和支持。

1966年,“文革”爆发,整理工作停滞。1971年,“二十四史”点校重新上马。1977年底《清史稿》和《宋史》相继付型,次年初出版,校勘工作完成。

### 最受质疑的是“底本”

由于受当时政治、学术等客观条件的制约,点校本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憾,自其出版后,学术界就出现不断讨论的札记文章,甚至有的还写出了专著。

中华书局总编辑、修订工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徐俊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说,“作为点校本的组织实施单位,中华书局一直关注这些意见,也觉得应该趁当年参加点校工作的部分老先生、中华书局参加过点校的一些老编辑还健在,能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的时候,尽快组织修订。”

点校本受质疑相对集中的就是底本的选择。每部史书在历史上都有众多不同版本,这就要求我们一直关注这些意见,也觉得应该趁当年参加点校工作的部分老先生、中华书局参加过点校的一些老编辑还健在,能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的时候,尽快组织修订。”

其次,是校勘记问题太略。这和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,当时校点的工作其实做得很扎实,发现

的问题很多,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。但这些工作在最后正式出版时很多没有得到反映。当时反对资产阶级繁琐考证,因此确立的原则是不改不校,尽量简洁,采取不主一本的方式,于是很多校记都没有被采纳。参加点校的先生曾说,当时还是很怕犯政治错误。所以说目前点校本反映的情况和实际工作达到的高度并不是一回事。

另外,点校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政治风气的一些影响。据徐俊介绍,政治对点校工作影响最大的时期,是1967年的短暂恢复阶段。那个时段,要求在点校工作中突出政治,强调连标点符号也要讲阶级斗争,认为“凡是美化帝王将相、宣扬封建道德、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,不应有感叹号”,如《明史》里这样的一段话:帝(崇祯)出宫,登煤山,望烽火冲天,叹息曰:“苦我民耳!”当时认为“苦我民耳”是骗人的鬼话,决不能用感叹号,要改用句号。再比如,前言里面充斥着阶级斗争的观点。不过,政治风气对内容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。

### 人力、物力上难达当年盛况

据徐俊介绍,目前各史主持人都是各断代史和专书研究的权威学者,这支队伍代表了断代史和基础文献整理的最前沿水平。整个修订工作从2006年开始筹备,今年7月11日,第四次修纂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,进度、责任基本上已经落实。预计2015年全部完成。

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尚君教授在此次承担了《旧唐书》、新旧《五代史》三部史书的修订工作。

他在接受快报记者采访时说,“客观地说,这次修订,学术目标比当年要高,但是人力、物力却不如当年。当时这是政治任务,可以压倒一切,当时抽调的都是各个断代史最权威的专家组成班子,大家可以抛下一切本职工作,全力以赴投入,国家可以动员一切资源满足研究所需的各种条件。”据他介绍,以复旦的工作为例,当时可以从北图把善本、胶片直接调来

复旦放在办公室里看,学校把现在相辉堂旁边的300号专门拨出来供点校组使用,从事整理工作的有将近二十人,大多是资深教授。但现在,就很难动员到人,主持人都要上课,要带研究生,科研压力也很大。复旦已经是很支持他的工作,专门给他配了两个助手,有几间办公室可以展开工作。南大在本就紧张的办公资源里,单独辟了一间办公室给武秀成,也已经很不容易。其次,总体投入的经费较为有限,目前整个修订工程从国家获得的经费几千万,只有清史工程的十分之一,比方《史记》的修订经费,还不到二十万。这与二十四史在古代文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相比是不相称的。可以说“二十四史”点校,几十年前是一项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,现在只是各种学术项目、工程中较为重要的一项而已,整个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

但也有有利的地方。第一,最近三十年来研究成果十分丰硕,学者们在充分利用前代成果的基础上,于专书、史实、人事、制度等各方面都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。当年整理的学术基础相对较为薄弱,专门史研究深度不够。第二,改革开放之后,很多保存在海外的善本都已经能够比较容易见到,可以得到较为便利的利用,如日本杏雨书屋藏《史记》北宋刊本六十九卷、静嘉堂文库藏北宋刊《吴书》二十卷、台北“中央图书馆”藏清孔钰谷《旧五代史》钞本,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。此外,经过近三十年来自国内各图书馆所藏善本情况的充分调查,发现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版本,如《旧唐书》、湖南图书馆藏有叶石君校宋本、上海图书馆藏明钞本,都部分保存了宋本的面目,对修订工作有很重要的价值。第三,现在技术手段日益发达,多数古籍都可以逐字检索,这是革命性的变化。以前要找某个词语、人名,得遍翻群书,还不一定找得到,现在只要检索一下就可以迅速完成。第四,现在学术风气自由,没有政治压力,可以心平气和、客观公正地来分析文本,决定取舍。

武秀成大概要数当今学界最耐得住寂寞的那些学者。从《旧唐书辨证》《陈振孙评传》《〈旧唐书〉本纪干支纪日考校》到现在参与“二十四史”修订,他所做的都是常人无法忍受的极端枯燥的工作。他的学生评价他“谦谦君子,温润如玉”,说话总是慢声细语,引经据典,将各版史籍中的错误讲得津津有味。作为《新唐书》校订工作的主持人,武秀成一直是《旧唐书》研究的前沿人物,但因为“二十四史”修订有个原则,各史基本由原整理单位继续进行,复旦大学原来校订《旧唐书》,所以这次接力重校。有些史则根据近年学术发展的情况重新选择承担单位,于是原先由师大校订的《新唐书》这次分配给了南京大学。

## 司马光也有搞错的时候

# 武秀成:穿越唐史的南京声音

## □快报记者 陈曦

### 《新唐书》“点校本”漏掉许多

梁周刊:为什么把重修《新唐史》的这项工作交给你? 武秀成:我也看了传媒的一些报道,这里面有一个误解。实际上不是在“重修国史”,只是在重新校订二十四史的“点校本”。虽然读者不是很计较,但从专业角度说不够严谨。业内人士会说,你们哪里在修史了。

点校本我们江苏一部都没有参加,此次重新校订有一个原则,就是原来这个部分由哪个单位承担的仍然让那个单位的承。南京这次承担了两部,赵生群校《史记》,我校《新唐书》,也是因为我们这二十几年来都是在从事这方面的文献整理研究工作,当然我对这个项目也很感兴趣,最后就由我们文学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承担下来。

梁周刊:在二十四史中,《新唐书》的工作量如何,状况复杂吗? 武秀成:每部史书在历史上都有众多不同版本,这就要求我们在充分确定一个好的底本。《新唐书》“点校本”选的是“百衲本”,底本选得比较好,我们在它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就行了。不像《旧唐书》底本选择不当,选的是乾隆时期武英殿的版本(注:关于《旧唐书》的底本陈尚君和武秀成之间有分歧),两千多年了,最近的《明史》也有两三百年的,它们在不断传抄刻印中会出现文字错误甚至包括错增、残缺。你在校订过程中,改动了古书的哪个地方,发现了哪些错误,是要做“校勘记”说明的。《新唐书》共225卷,校勘记总计631条,平均每卷不到3个校记,改正了两三个错误。事实上远远不止,有的卷都有十几条二十几条甚至上百条,平均下来每卷都有十几处错误。

梁周刊:《新唐书》“点校本”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方面? 武秀成:主要问题有三点。一个是点校本的校勘比较少,漏校的比较多。这些史籍流传了这么多年,远的如《史记》,两千多年了,最近的《明史》也有两三百年的,它们在不断传抄刻印中会出现文字错误甚至包括错增、残缺。你在校订过程中,改动了古书的哪个地方,发现了哪些错误,是要做“校勘记”说明的。《新唐书》共225卷,校勘记总计631条,平均每卷不到3个校记,改正了两三个错误。事实上远远不止,有的卷都有十几条二十几条甚至上百条,平均下来每卷都有十几处错误。

梁周刊:《新唐书》“点校本”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方面? 武秀成:当然,有很多。比如武则天时代有个宰相叫陆元龟,他在武则天朝做了两次宰相,在第二次任宰相时,《新唐书》里面记载“庚寅,陆元方罢司礼卿”,要免了司礼卿的职务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“庚寅,罢为司礼卿”,从宰相降为司礼卿。两个意思完全不同。初想起来,《新唐书》的记载不合情理,因为前面刚说他做宰相做了七个月,没有罢他的宰相怎么说罢他的司礼卿呢,确实有疑问。“点校本”就根据《资治通鉴》写了一条校勘记,认为可能是《新唐书》脱了一个“为”字。

我认为,《资治通鉴》错了,“点校本”也错了,应该是“庚寅,陆元方罢。”,而“司礼卿”是下面一个人的官职。这个人叫阿史那,他是突厥族的一个首领。前人为什么把“司礼卿”归上呢?就是武则天多数民族首领怎么可能当中原朝廷的官呢?这种现象很少。我后来考证,《册府元龟》里面有记载,阿史那确实是做了司礼卿,而且记载的跟《新唐书》是一件事情。另外,陆元方本传里面也有记载,他罢了宰相之后做的是“太子右庶子”,而且唐朝有一个宰相给他写的墓志铭里面也有记载,陆元方根本没有做过司礼卿这个官,他既不会“罢司礼卿”,也不会“要为司礼卿”。“某某罢”是《新唐书》一个特殊的文例,一般专指宰相、三省长官或军队统帅罢职,不用于一般官职,不写作“某某罢为某官”。这是《资治通鉴》犯的一个错误。



武秀成是当今学界最耐得住寂寞的学者之一 快报记者 路军摄

不严。校书改字是必须的,但校改的范围应该有明确的认识,而一般仅限于是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文字讹误,即传抄刻印中出现的错误,对著者由于知识、见解或其他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讹误一般不作改动。其区分的标准在于:是恢复古书的原貌,还是替古人修改著作。点校本在对待《新唐书》本身的错误,即著者笔下错误,处理方式不太一致,有的处理是不改正文,而只在校勘记中指出其误,这是正确的,但另一方面,点校者对同样性质的讹误又进行了补改,这是有违校勘原则的。

### 《资治通鉴》也误改了史料

梁周刊:你列举一些新发现的讹误事例。 武秀成:当然,有很多。比如武则天朝做了两次宰相,在第二次任宰相时,《新唐书》里面记载“庚寅,陆元方罢司礼卿”,要免了司礼卿的职务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“庚寅,罢为司礼卿”,从宰相降为司礼卿。两个意思完全不同。初想起来,《新唐书》的记载不合情理,因为前面刚说他做宰相做了七个月,没有罢他的宰相怎么说罢他的司礼卿呢,确实有疑问。“点校本”就根据《资治通鉴》写了一条校勘记,认为可能是《新唐书》脱了一个“为”字。

我认为,《资治通鉴》错了,“点校本”也错了,应该是“庚寅,陆元方罢。”,而“司礼卿”是下面一个人的官职。这个人叫阿史那,他是突厥族的一个首领。前人为什么把“司礼卿”归上呢?就是武则天多数民族首领怎么可能当中原朝廷的官呢?这种现象很少。我后来考证,《册府元龟》里面有记载,阿史那确实是做了司礼卿,而且记载的跟《新唐书》是一件事情。另外,陆元方本传里面也有记载,他罢了宰相之后做的是“太子右庶子”,而且唐朝有一个宰相给他写的墓志铭里面也有记载,陆元方根本没有做过司礼卿这个官,他既不会“罢司礼卿”,也不会“要为司礼卿”。“某某罢”是《新唐书》一个特殊的文例,一般专指宰相、三省长官或军队统帅罢职,不用于一般官职,不写作“某某罢为某官”。这是《资治通鉴》犯的一个错误。

梁周刊:国家修清史会参考“清史稿”吗? 葛剑雄:是重新编修,跟清史稿没有关系,清史稿最多做个参考。大家是不承认清史稿的正史地位的,只是因为加上清史稿有个“二十五史”的说法,现在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,当然不是在清史稿基础上,而是重新一部史书。

## 葛剑雄:绝不能叫“重修”

对中华书局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和《清史稿》的修订工程,著名学者、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认为此次修订是古籍整理界的一大盛事,规模巨大、影响也将极为深远。但媒体以“重修国史”的标题广泛传播,实为误导,“修史”和“校订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,“国史”的用法也极为不妥,媒体应该引导民众正确认知。

梁周刊:对此次重修,您是什么看法? 葛剑雄:完全是误导。现在中华书局进行的是一次文献整理,把以前出过的二十四史做一次修订,修订的不是它的内容,而是文字方面的整理、校勘、标点。我们怎么能重修《史记》、重修《汉书》呢?只能叫校勘、出版。

“修国史”也不是说一般写个历史书就叫修史了。国史就是国家正式的历史,在中国历来只有国家才有资格做,民间的、私人的撰写是不算的。所有的国史除了《史记》是个人修的以外,几乎都是由政府组织班子修的,个别个人修的也是得到了后人承认才称为所谓“正史”。另外,“国史”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念,我们的“国史”不等同于中国的通史或中国历代的断代史,自身所处的这个朝代、这个政权的历史才能叫国史,前朝的历史就不叫国史了。今天只有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”才能称为“国史”。这个是有区别的,千万不要乱用什么重修国史,绝对不能用重修这两个字。

我相信负责这项工作的人他本身是不会这么说的。媒体这样讲,只能是起到误导的作用。不知道是媒体没有知识,还是故意夸张这个事情以炒作。

梁周刊:这次重新校订有没有必要? 葛剑雄:当然有必要。本来按照规范,所有的改动都要标出来,应该写校勘记的,但当时说这个是资产阶级的繁琐哲学,改了就算了,事实上改得未必对,而且人家不知道你改的依据是什么。当且有些人专家不让他们参加,还有的时候政治上考虑过多,比如有的书这样写比较有利。

还有这些先天不足。当时有的本子没看到,现在条件好了,能看到了。比如说《史记》有些文字当时点不断,但这些年代发掘出来不少秦简、汉简,有些就可以根据这个来标点、校对。另外,当时由于时间限制,一些工作做得不够细致,比如蒙古人的名字标点,这个字是两个人的名字还是三个人的名字,没有详加考证。

古人有个说法,校书像扫落叶一样,这里刚扫干净叶子又落下来了,小的错误是不断有的,现在重新做当然有这个必要。但还不能指望这次能把这些错误都消灭了,总体原则应该是提高质量。现在的时间比较从容,可以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,加上新出土了一些文献,可以纠正一些错误。但这些校订都是技术层面的,不涉及到史实和内容。

梁周刊:《旧五代史》已经失传,不见原貌,那它的修订难度是不是最大的? 葛剑雄:这个不好这么说,我不赞成这个说法不对的。每一部史的修订都有一定的难度,不能因为校对量大或改动字数多就说它难度大。不能有这个标准。有的书校订出一个字很难,校订出十个字倒比较容易。而且修订水平到底如何,还要让后人来评价,不是现在就能评价出来的。尤其现在,大家都在做,不要急着评价,等出来以后让学术界、让后人来评价。

梁周刊:国家修清史会参考“清史稿”吗? 葛剑雄:是重新编修,跟清史稿没有关系,清史稿最多做个参考。大家是不承认清史稿的正史地位的,只是因为加上清史稿有个“二十五史”的说法,现在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,当然不是在清史稿基础上,而是重新一部史书。